

日治時期移入台灣社寺建築——
花蓮慶修院建築特質與意涵之研究

A Study of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implication of the
Religious Building

Chingshuo Court in Taiwan Built by Japanese
Immigrants During the Colonial Days

陳 建 豐

中國技術學院建築工程系講師

CHEN, CHIEN-FONG

Lecturer Dept. of Arch. CKIT

摘 要

台灣東部的花蓮，在清代一直視為后山蠻荒之地，源自中央山脈的七腳川在現今吉安鄉附近沖積出一片肥沃的平原；原住民阿美族在此建立了自己的聚落，直到清中葉以後，才逐漸有漢人足跡進入。日治時期為施行其殖民政策，有計畫地向台灣移民，這片較少開發的土地，自然成為一個適當的場所。日人取四國吉野之名，在原七腳川的荳蘭社建立吉野移民指導所，下轄吉野、豐田、林田三個移民村，到了大正末期已然形成規模。

為了撫慰新移民，殖民政府除了建立道路、水圳、醫療所、小學校等設施外，更建立了布教所，藉宗教的力量使開發的過程更為順利。移民的主要信仰是屬於佛教本願派的真宗，因此在三處移民村的官營布教所也都以真宗為主，但另一方面在吉野村內也有一批信仰真言宗的移民，以私人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布教所。

花蓮吉安慶修院的前身，是興建於大正六年（1917）的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為日本四國德島縣奉祀真言宗信仰移民所建。四國八十八所靈場道路，是日本佛教重要傳統活動場所之一。信眾以步行參拜八十八所名剎，也追思著弘法大師空海的行誼。慶修院兼有日本社寺風格的獨特類型，以及隨著時代及地域風土氣候條件等變遷，反映宗教文化與風土氣候特色，亦應重新受到合理的評估。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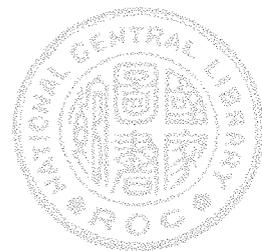
Located at the eastern part of Taiwan, Hwalian was regarded as a wild land during Ching Dynasty (17~19th centuries). Originated from the Central Mountains of Taiwan, the Chika Creek created a fertile plain near the Chian Shiang of Hwalian where one Amei tribe had settled. Until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Ching Dynasty, not a mainlander had appeared ther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of Taiwan,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a policy to migrate Japanese people to Taiwan, consequently the Chian Shiang of Hwalian became one of the places proper for the new comers. Named after the Yousino of Shikoku in Japan, the Yousino migration office was set up to offer assistance to the migrants of the three villages, i.e., Yousino, Toyota, Hayashita. By the end of Daise period, these villages already had quite a number of villagers.

In order to soothe new migrants from Japa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built the roads, water courses for irrigation, clinics, elementary schools, as well as religious centers. so as to smooth migrants' settlement process. The major belief of villagers was Shinshu of Buddhism, therefor official religious centers set up by the migration office in the three villages were based on that belief .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migrants of the Yousino village who believed Shingonshu of Buddhism, therefore they built their own religious center separately.

The Chingshuo court in Hwalian , formerly a Japanese religious center, was built in 1907 by migrants from the Shikoku in Japan whose belief was Shingonshu. The worship route connecting 88 famous temples in the Shikoku was one of Japanese Buddhist s' the worship route important traditional activity places. To visit and worship 88 temples on foot along the believers tried to memorize the great deeds of Buddhist Kukai.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gshuo Court in Hwalian was influenced by the unigue species of early Japanese religious building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s building style reflected changes in regional climate which is unique in Taiwan. Form the standpoint of both religious cultured and regional climate, it would be worthwhile to re-evaluate the architectural importance of the Chingshuo Court.

關鍵字：社寺建築、佛教、真宗、真言宗。

Keywords: Religious building, Buddhism, Shinshu, Shingoshu



壹、日治時期社寺移入台灣的背景

日本政權自 1894 年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後於翌年入主台灣，其統治政策以「綏撫」為主，故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統治政策對於宗教政策有其必然性之影響。當時，在台灣出現的宗教，除台灣原有的傳統中國民間信仰外，還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同時日本本土宗教亦隨之而來，包括日本「基督教」、「佛教」以及「神道教」等，其中基督教與佛教原是隨異國文化傳入日本，而神道教則是日本的本土性宗教。神道教以其特殊性，在明治天皇推動明治維新之後，想要「王政復古」時，即把神道教推出來，但在推動「神道國教化」時並不順遂，遭受到原本強勢宗教的反彈與抗拒，後來利用戰爭時期以神社作為收攬民心的場所，「神道國教化」得以順利推展。

台灣總督府為了加強殖民地人民的精神面，便以國家神道的神社為主軸，扶植及大量增設神社，壓制屬於非主流的社、祠與寺廟，具體作法是以建造神社運動開始，並在平地、蕃地如火如荼展開，除強化國家系統的神社外，對於民間信仰的寺廟，不是將其收編為國家系統所用，就是遭到廢除的命運。當時在台前後興建的日本各級神社數量達二百零四座，而寺則遠少於此，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日治時期台灣社寺與宗教政策，在「神道國教化」推行中，因明治政府於 1890 年 4 月 27 日廢內務省社寺局，改設神社局及宗教局，將神社與宗教分開，故神社與寺廟規模與階級在日治初期即確立與展開。

神社的建立是日治時期實行的宗教政策中相當重要的部份，其建造設計系統、建築樣式與區位，皆影響日治時期台灣寺廟建造的表現。事實上以佛教式樣為主的中國建築樣式（唐式建築、密教建築等），在奈良、平安時代傳入日本以後，隨著時代的演進，與日本傳統的神社建築等逐漸產生相互影響的交流現象；諸多格局以至細部語彙，也多有混用現象，在鎌倉寺町時代，亦已在寺院建築中出現「折衷樣」的形式。明治時代雖有神佛分離的政策，但長久以來社寺建築相互影響的文化現象卻不是以一紙政策就能完全切斷的。

本研究真言宗慶修院雖非屬神社建築，但在日人宗教政策推展下，為反映殖民統治的國家政策，對於日本社寺的形成概念與台灣氣候影響進行研討，進而解析花蓮慶修院的興築背景、特質與建築意涵。

貳、慶修院的興築過程

一、移民村初期的真宗布教所

日治時期五十年間的對台移民政策，使得台灣在這段期間內移入了為數甚多的日本內地民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的多管齊下，影響台灣產生了極大的變化。¹

花蓮的吉安地區，是台灣最早引入日本移民的地區之一。明治三十二年（1899）由賀田金三郎設賀田組，採私營移民方式招募拓墾，²然以水土不服及「蕃」害等問題而終告失敗。明治三十八年（1905）開始官營移民階段，五年後，在花蓮港廳轄下選擇了荳蘭社成立移民指導所，並陸續建立了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三處移民聚落。經過四年的努力，到了大正末年，已然規模完備，以吉野村而言，戶數達三百三十戶，人口一千七百餘人，是一個擁有道路、輕便鐵路、灌溉水圳（吉野圳）、醫療所、小學校、

¹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1919，頁 54-57。

²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1919，頁 10。並見苗允豐《花蓮縣志》，卷五，花蓮縣文獻會，1979，頁 20。



郵局、派出所等完備設施的移民村。

吉野村下轄宮前、清水、草分三個部落，而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則設於宮前與清水兩個部落間，自成一個獨立的小聚落。指導所範圍內有學校、警察官吏派出所、倉庫、醫療所、宿舍以及布教所等設施，是整個移民村的行政中心。

爲了撫慰移民的精神，吉野、豐田、林田等三個移民村在規劃之初除設有神社之外，並有官方的布教所。按當時移民信仰比例，佛教的「真宗」在三個村內所佔皆爲最高，初創的布教所自然也以真宗爲主。

（一）吉野村

吉野布教所是三個移民村中最早設立的一處。明治四十四年（1911）吉野村基礎設施大致完備時，吉野布教所也同時落成。不幸第二年九月十六日大颱風，將吉野村的建設和兩百四十戶家屋幾乎移爲平地，民眾露天就食狀頗淒慘，一切又需要重新開始。災後重建的布教所規模仍不大，構造亦顯簡略，曾由真宗派本願寺派出員岡本泰道任布教師，並成立說教組織在佛教青年會、婦人會中布教。

（二）豐田村

豐田村在大正元年（1912）間開始探勘基地，因受風災影響了開發進度，次年四月成立指導所，當年就引入了一百三十九戶六百七十四名移民。豐田布教所於同年七月成立（早於神社一年），翌年七月因颱風毀損後重建，大正四年七月落成。大正三年十一月起由本願寺派榮淨雲任布教師，並兼任林田村布教師職，每月二十五日在布教所宣教，並於其它時間赴各部落說法，影響甚廣。

（三）林田村

林田村第一次接受移民在大正二年末，是三個村裡最晚的一處，但布教所也幾乎是同一時間成立。最初由榮淨雲兼任布教師，大正五年十二月起由藤本信西接任。每月十六日在布教所定期宣教，其餘時間亦機動赴各部落說法。

二、真言宗布教所的創建

吉野、豐田、林田三處移民村落，在大正七年（1918）時的總戶數爲六百八十四戶，扣除基督教二戶，神道十三戶，天理教八戶之外，其餘六百六十一戶都是持佛教信仰；其中又以真宗的四百二十九戶佔全佛教信眾的六成半，無怪呼「真言宗」在官方所設的布教所成爲主流。

豐田村的真言宗信仰有二十二戶（13%），林田村更少，只有十戶（6%），但在吉野村信仰真言宗的住戶達七十二戶（23%），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³基於宗教上的信仰與堅持，吉野村的真言宗信眾，在官方所設「真宗」布教所之外，另行籌設「真言宗」的布教所，也是一個極爲合理的舉措。

大正六年（1917），吉野村民川端滿二向村內信眾募集款項，籌建真言宗布教所。⁴雖然相關記載也沒有出現在大正八年出版的「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圖」之中；但是由民國四十六年慶修院慶祝創建四十週年的照片檔案（照片1），再與《花蓮縣志》⁵比對，可以確認創建的時間與人事。

在官方「報告書圖」中，曾出現真宗吉野布教所的照片（照片2），以及三處布教所的平面圖（圖1），

³ 東台灣研究會，〈花蓮港廳下的產業〉，《東台灣研究叢書》，台北，1926，頁64-70。

⁴ 東台灣新報社編纂，《東台灣便覽》，東台灣新報社，1925（大正14年），頁105。

⁵ 苗允豐，〈民族宗教〉《花蓮縣志》，卷五，花蓮縣文獻會，1979，頁51。



發現這三處布教所幾乎完全相同，可以相信是基於「標準圖」下的作品。慶修院的前身是否也是如此？由於缺乏原始文獻不易查考，但由現況和「報告書圖」的資料比對，兩者間除了正面為向拜入口外，基本上並不相同。

在查考大正八年出版「報告書圖」，所示吉野布教所的地點，位在小學對面，事務所左前方，事務所即現在鄉公所位置。現布教所早已不存，原址已成爲新建農會，現慶修院所在處，應爲當

時移民宅第之一，由院內現存的「光明真言百萬遍」石刻等文物，更可確認真言宗布教所與官方所設的真宗布教所不同。



照片 1 吉安慶修院建造四十週年紀念
(張梅枝女士提供)



照片 2 吉野村布教所照片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1919，卷頭添附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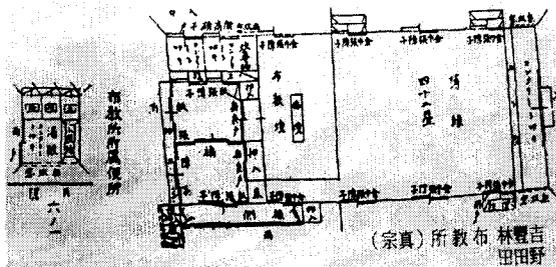


圖 1 布教所平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灣總督府，1919。)

三、真言宗布教所與四國八十八所

吉安原名七腳川，日據時期一度改名爲吉野。按「報告書圖」所示，吉野原爲七腳川畔的原野，日據初最早的移民，係來自四國德島縣的吉野川沿岸。以其字義良好，又爲日人所熟用，故改七腳川地名爲吉野。⁶

移民將原鄉的文化移入新的墾殖地，是一種極爲自然的現象，除了前述的地名移植外，諸如飲食、信仰等文化，也會相當自然的隨之移入。清代大陸向台灣的移民帶入了潮州、同安厝、泉州街等地名，也移入了媽祖、觀音等信仰；日據時期引入的松山、吉野等地名，也傳入了來自日本的佛教宗派。大正七年（1918）以前的日本對台官營移民，以九州福岡縣籍的一百四十一戶最多，其次則爲四國德島縣的九十二戶。

四國八十八所名刹，在日本傳統佛教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與之齊名的還有四國三十三所觀音，近畿三十六不動尊等巡禮，其中最爲古老且最著稱的仍爲四國八十八所。日人稱爲四國八十八遍路（即參拜巡禮之意）。參拜者穿著仿空海法師時期的白裝束，背著「奉納同行二人」的袋子，柱著金鋼杖，步行環繞四國境內八十八所古刹，以祈求平安。⁷巡禮的路徑經過四個不同階段：

- 1.發心的道場，（阿波國·德島縣）第1番至第23番。

⁶ 參見(a)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花蓮文獻》4期，花蓮，1955，頁93-94。

(b)東台灣研究會，〈模範的內地人移民村吉野村的概況〉，《東台灣研究叢書》第2篇，台北，1924（大正13年），頁71-79。

(c)花蓮港廳，〈花蓮港廳要覽〉，花蓮港廳，1939（昭和14年），頁26-28。

⁷ あるつく社編，〈四國歩く地図〉，東京，1998，頁138-139。



- 2.修行的道場，(土佐國·高知縣)第24番至第39番。
- 3.菩提的道場，(伊予國·愛媛縣)第40番至第65番。
- 4.涅槃的道場，(讚岐國·香川縣)第66番至第88番。

修行人由第一番的靈山寺一乘院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回到第八十八番的大窪寺遍照光院，完成一次巡禮。倘有勝者，更會由各所恭迎神佛石像同返，以為守護庇佑的依藉。這些石雕的佛像多呈坐姿，並在像座上雕有佛寺名稱及「第幾所」的記號以供辨識之用。

川端滿二建立真言宗吉野布教所之後，返回四國故里；迎回了八十八所的佛像，以當時的情況而言，沒有強烈的宗教熱忱，是不太可能做到的。這股信念在目前雖然沒有任何文字記錄遺留，但由石像文物上的「第二番極樂寺」、「第十二番燒山寺」、「第三十七番延本寺」等字蹟，仍使後人深深為之感動。

目前台灣除了在吉安慶修院四國八十八所的石雕佛像外，在台北市同為日據時期的佛教名剎臨濟護國禪寺，也保存著不到十尊來自四國八十八所的佛像。以保存的數量而言，很可能是外界個別攜來膜拜，而不是「遍路」的全數奉祀，其價值雖亦珍貴，但仍不如吉安慶修院的珍藏。

參、慶修院的建築特質分析

一、平面

(一) 基本格局

吉安慶修院本殿面寬三間，進深四間，略成方形；中央開間向後延伸，後方為布教壇，進深為四間，本殿三邊帶廊，正面入口再作「向拜」出簷，總面積約九十平方公尺，平面略呈凸字形。同為大正初所建的吉野、豐田、林田三村的真宗布教所，皆為長方形平面，面寬七公尺，進深十九公尺，總面積約一三三公尺，規模亦不大，很可能因為受到布教所位階等級較低和移民財力所限，僅能聊備一格而已。

(二) 四注式的寶形造建築

寶形造為日本建築式樣的主要屋面類型之一，與中國建築的攢尖式屋面極為相似。寶形造又可依其平面分為四注(即方形平面)，六注等，而寶形造極為著稱的代表性建築法隆寺東院夢殿，則為八注的格局。

四注的寶形造建築，在日本的案例頗多，如兵庫縣淨土寺淨土堂，大分縣富貴寺大堂等。自地面上以礎石和落地抬高建物的地坪，以階梯通達架高的地板面，四周繞以出簷廊下空間，也是室內和室外的過渡場所；由中央向內則為室內方形平面的本殿。

四注式建築在日本佛寺中，常作為重要建築如本堂、大堂等，與中國較常用在次要建築的習慣不同。

(三) 融合社、寺風格的平面

慶修院的平面基本形式雖為寶形造，但在頗多部份則以在「寺」建築中滲入了「社」的語彙。較為明顯的有下列幾項：

1.向拜：

中國建築東傳至日本，起初並沒有在正面屋簷破口前引底作出「向拜」或破風的作法，後佛寺建築與神社建築相互影響下，向拜的手法也常在佛寺中使用，連帶的向拜屋面下的木構架，也成為建築的主要裝飾。



2.高床：

高床指的是架高的地坪，與中國南方民居中的吊腳樓相似。中國傳統建築寺院建築中常用實體的台基抬高地坪，早年傳入日本的佛教建設等亦採此手法，後受神社影響也多有採高床的作法。初期只作高床，但逐漸也參照社的作法，在四周加作欄杆。

3.奧陣：

一般日本社寺在本殿、本堂的內部空間，多分前後殿或內外陣空間，外陣為參拜空間，內陣為神佛的居所，平面多呈正方形或長方形。吉安慶修院在四注屋面下，界定的是三參拜空間，但在其後，卻延伸了一個獨立的布教壇，使平面呈凸字形。日式建築一般多在前方凸出作拜殿稱「吉備津造」，但向後拉長的作法則較少。佐賀縣的多久聖廟「孔子廟」，在分類上屬於靈廟建築，在平面上作有裡層的奧陣作為祭祀空間，慶修院是否與之有關並不確認，但這種罕見的作法卻是慶修院的一大特色。

(四) 空間使用

按「移民事業報告書圖」所示，吉野、豐田、林田三村的真宗布教所，平面幾乎完全相同。入口有廊，前為布教空間，內為布教壇（佛壇），最後則為布教師的生活空間，計有臥室兩間、炊事場，由布教壇側的小門，可經一段廊道通廁所；是一種將布教與居住結合的建築空間。

由慶修院遺構觀察，真言宗布教所始建時只作為單純的布教空間，居住空間則在外圍另建小屋，與真宗布教所完全不同。後期增建的東側屋和過廊，則是因使用需求的添加並非原系統。

二、造形

慶修院外觀上最為特殊的應為寶形造的屋面形式，及其延伸的布教壇。寶形造的外觀在日本並不鮮見，四國八十八所名剎中，就有相當多寺院採寶形造，如第一番靈山寺、第二番極樂寺、第十番切幡寺、第十九番立江寺、第三十二番禪師峰寺、第三十四番種間寺、第四十二番佛木寺、第五十四番延命寺、第五十八番仙遊寺、第六十番橫峰寺、第六十五番三角寺、第六十六番雲邊寺、第六十七番大興寺、第六十八番神惠院、第七十三番出釋迦寺、第七十七番道隆寺等。而四國八十八所最為崇敬的弘法大師空海，其位於和歌山縣高野山大本山的金剛峰寺御影堂，也是採四注寶形造形式。對故鄉寺院形式的引用以及對空海大師高野山的崇敬，為吉安真言宗布教所的特殊外形，提供一個相當合理的推論。

(一) 高床、高欄

慶修院在高床下先築台基並以大塊卵石收邊，平整的台基上立礎石以承落地木柱。礎石上作礎磐（柱礎），向拜的兩支木柱下的礎磐並以水泥修飾成江戶末期禪宗樣形式。高床下共有五十九支基柱（柱與緣末）落地，外圍柱落地並沒有作「地覆長押」（繫樑），平台的正面與左右兩側上作高欄，是一種溶合了社、寺風格的表現手法。

(二) 向拜

正面引出的向拜，是慶修院外形上的另一個特點，兩支立柱撐起外伸的屋面，正向的頭貫（額枋、壽樑）與側向的繫樑（末作虹樑）上承「三斗六枝係」⁸斗拱，頭貫兩端出木鼻雕飾，整體呈現著濃厚的江戶時代風格。

⁸ 近藤 豐，《古建築の細部意匠》，東京，大河出版，1969，頁 78。



(三) 屋 面

慶修院屋面為重簷，以其規模不大卻作重簷，是較為特殊的現象。原有屋面材質已不可考，一般日本社寺屋面有草、木皮、瓦、金屬（銅）等作為頂部覆蓋材料。以花蓮地區颱風頻仍，草頂與木皮頂似不可能，而瓦頂自重甚大，慶修院的下簷屋面不太可能支承，故始建時應為金屬板屋面，並很可能是銅皮屋面後因損壞才更改為現有鐵皮材質。

寶形造屋面頂點，一般有露盤、寶珠、相輪等不同的收頭方式。慶修院採寶珠、露盤，石雕的桃形寶珠與覆盆式伏砵，承於鐵質露盤之上，整體造形優美，作工質樸，成為慶修院重要的視覺焦點。

三、建築構造

吉安慶修院基本上遵循日本傳統構造形式，結構形態以木構架系統為主；屋頂為日本寶形造（四注攢尖），屋面卻鋪以金屬皮浪板，是少有案例。具講堂及祭祀之功能，是為較莊嚴的場所。

(一) 正殿（布教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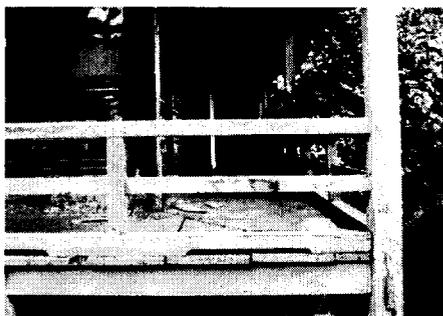
正殿是吉安慶修院建築中最主要的空間，邊長七公尺之正方面平面，正面三開間，側面四開間。唯正面主要入口處開口較大，其餘各開間之柱距皆唯一·七五公尺，左右兩側之前面三開間有兩個門扇，亦可成為開口。門扇腰高一公尺，腰上分為八格安裝玻璃。故正殿之採光、通風十分良好，空間十分之流暢。實符合花蓮高溫、潮溼之本土性氣候。但與一般日本寶形造建築之傳統門窗開口方式截然不同。正殿後側銜接布教壇，角落之兩牆面為檜木灰牆面。天花高度三·五公尺，天花板下間隔五十公分釘有平行木條。慶修院為高床式木構架台基支柱直接落於地面，以水泥澆灌成柱礎，另外加有小柱補強支撐地板，地板高度一·二〇公尺，亦為木質地板。

(二) 布教壇

布教壇是吉安慶修院放置祀奉之神像與佛具之處，空間較為封閉，開窗也較少。為一般信徒之禁地，多少莊嚴中帶有點神祕之色彩。寬三·五公尺深五·五公尺與正殿形成一凸字型平面，同樣為木構造，三面牆皆為檜木灰牆面，左側僅開有一小窗，右側有一小門，可通往布教師之生活空間。

(三) 迴 廊

日本社寺建築多半為高床式台基，寶形造因四面開口擴大台基形成迴廊。而慶修院之背側銜接布教壇，所以迴廊只於正面及左右兩側，成一U字型。周圍加作高欄，以防信眾跌落。兩側高欄配合結構各有五支木柱，支撐屋簷。欄杆之線條簡單，沒有雕刻等裝飾。（照片3）



照片3 慶修院之迴廊

(四) 東側房

據慶修院建築呈現之建材組合、平面、立面等資料，東側房應為增建之廂房。可通布教壇與過水廊。

(五) 屋 架

慶修院的建築整體來說，最為特殊的地方應屬寶形造的屋頂造型，及其延伸的布教壇。故在屋架的構架方面亦令人注目。一般木構架建築，多半由幾組的屋架組合而成，每個屋架皆由一中柱（中間柱）、二支主椽（合掌）、繫樑（陸樑）組合而成。而慶修院之寶形造屋架，只有一支中柱。整個主殿屋架，就



如同一個大屋架組合而成。四支大樑以榫接交錯成「手」字，與柱子形成一柱樑結構體。中柱高三·四公尺，榫接於二支成「十」字形樑之交點上。類似「寄棟屋造」之南瓜束（棟木、妻合掌、二支合掌、二隅合掌共六支大木匯集合流點）有四支隅合掌、四支妻合掌匯集於中柱。⁹慶修院的屋面成下凹的曲面，妻合掌彎曲成曲線狀，並刻成六角形，以便於釘上桁條及斜撐，整個屋架就如同有四組中柱式桁架（真束小屋）。屋架之鐵件有吊桿、鉤釘補強。隅合掌、妻合掌以榫接的方式於中柱支柱頭，並有二組方形桁條木接合固定，桁條木組上放置露盤寶珠。

布教壇上屋架較為簡單，由三組桁架，跨距較小，桁架之間距只有一·八公尺。而在第一組桁架之中柱上掛有一匾，中央撰寫「本尊弘法大師天下太平國土安全諸願成就祈攸」，左側「不動明王」，右側「毘沙門天王」。

四、裝飾與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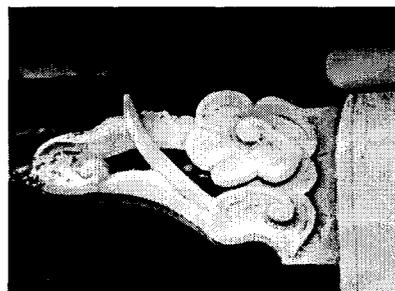
慶修院之前身是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為日本四國德島縣奉祀真言宗之移民所興建。建於大正六年（一九一七）。當時之移民多較為窮困，故慶修院的造型也就以素雅為主。只有在入口的向拜有較多的裝飾文樣。

（一）木 鼻

木鼻是指木端之意。頭貫、虹梁等橫架貫穿柱子之裝飾雕刻。寺院建築在平安時期前並未發現有木鼻飾雕，應是在鎌倉時代傳自大陸之新樣式（大佛樣、禪宗樣）。甚至連和樣也受到影響，木鼻之形式多樣化，輪廓及雕刻有其時代性之特徵。¹⁰

木鼻可分大佛樣系木鼻及禪宗樣系木鼻。前者多有象鼻捲曲之意象，後者多以植物、雲浪為素材。慶修院的木鼻同時擁有上述兩系統之表徵。同時有捲曲的象鼻、象牙及植物的雕刻。

（照片 4）



照片 4 慶修院向拜右側木鼻

（二）臺 股

臺與日文的蛙同音，如同青蛙跳躍前之姿勢。宋朝時期由駱駝的雙峰聯想，有「駝峰」之稱。臺股自中國傳入日本，位於虹梁上兩斗拱間之橫架材，由人字柱之發展而來。有板臺股及割杖（鑿穿）臺股兩種。¹¹

慶修院屬於板臺股，當時的工匠應取材自江戶時代之雛形本。（照片 5）



照片 5 慶修院頭貫上臺股

⁹ 人見春雄、野呂肖生、毛利和夫，《文化財の見方》，東京，1997，頁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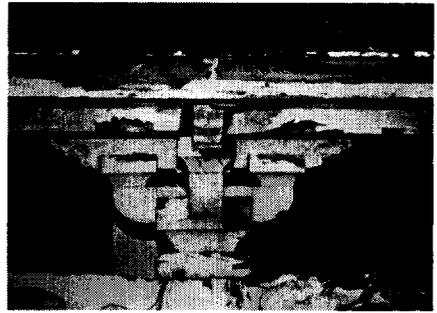
¹⁰ 近藤 豊，《古建築の細部意匠》，東京，大河出版，1969，頁 128。

¹¹ 近藤 豊，《古建築の細部意匠》，東京，大河出版，1969，頁 128，頁 115。



(三) 斗 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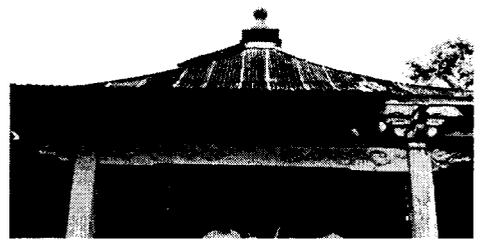
日本社寺、宮殿等建築在簷下柱頭之間或內部天花週邊等處，有各種之木構件，有繁有簡的構造組合是很普通的現象，這些木構件組合稱之為斗拱。斗拱是中國建築最重要的構造之一，也是最有特色的細部。這個古老的發明早在漢代建築中便被利用。伴隨著時代的替換而發達變化，各時代、各地方甚至各國都有其顯著的特色。這種特異的手法（斗拱）隨著佛教建築傳入日本，一方面受中國之影響，一方面創造出日本獨特之變化，與時代之特徵。慶修院在向拜出簷的兩個柱頭都有斗拱，係日本「三斗六枝係」¹²（照片 6），大斗與柱頭間之「皿斗」的變化，在日本的社寺建築斗拱大系中，是種十分罕見的變形。而在三卷斗上方之「手挾」之雕刻，類似花草之曲線。整體之斗拱來說與江戶時代延曆寺大講堂（已燒失）十分之類似。



照片 6 向拜左側斗拱(三斗六枝係)

(四) 頭 貫

頭貫指連貫柱頭之橫梁。在日本社寺建築中，較少運用頭貫，而採用虹梁來連接斗拱，並在虹梁上加以雕刻裝飾。和樣式到鎌倉時代開始有貫穿柱子形成木鼻之案例。慶修院之頭貫上亦採用較為抽象之植物曲線之線條。（照片 7）



照片 7 向拜之頭貫

(五) 裝 飾

慶修院的裝飾展現於入口向拜的整個木構架，頭貫、三斗、木鼻、臺股等構件，流露著極為典型的江戶風格。慶修院並非華麗之社寺建築，傳統之日式建築融合本土之氣候增添了慶修院的獨特風格。又在川端滿二的用心努力經營下，留下了許多的文物，更增添慶修院在佛教建築上的文化色彩。

肆、慶修院的建築意涵探討

一、獨特的布教空間

花蓮吉安慶修院的前身，是興建於大正六年（一九一七）的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為日本四國德島縣奉祀真言宗信仰移民所建。四國八十八所靈場遍路，是日本佛教的重要傳統之一，信眾以步行參拜八十八所名剎，也追思著弘法大師空海的行誼。

移民引入了真言宗的信仰，也移入了日本的佛寺建築。初建的布教所規模不大，和真宗布教所不同，將布教和居住空間分開，以維持宗教空間的神聖性。後期雖有增建東側房和過水廊，但原始格局卻依然清晰可辨。

社、寺在日本是兩個相當不同的信仰，原始建築形式也大不相同。隨著時間的演變，社寺之間產生了相互影響的現象。慶修院外觀採日本傳統的寶形造，但在向拜、高床、高欄、奧陣等處，則明顯的滲有神社的風格。另一方面。在主要入口向拜空間的頭貫、三斗、木鼻等構件，流露著極為典型的江戶風

¹² 近藤 豐，《古建築の細部意匠》，東京，大河出版，1969，頁 128，頁 76、78。



格，也顯示了始建時期必然有熟悉日式社寺建築的大木匠師參與。

四注屋面的寶珠、伏鉢、露盤，內部的小屋組構架，四壁帳子，室內木地板、神像以及庭園的不動明王像、石刻、四國八十八所石佛像等，在在都顯示著始建時期執事者川端滿二等人的用心。

二、反映風土氣候之建築形式

- 1.慶修院四注式寶形造屋面，有利於遮陽與遮雨排水，而台灣為濕熱多雨氣候，故這種屋面似乎非常適合台灣的氣候。由於四注式寶形造屋面是日本佛教建築特色之一，而日本佛教建築係由中國傳入，而中國佛教又是由印度傳入，古印度主要文明地區屬於熱帶氣候，因此這種屬於濕熱氣候之建築特徵，在日本可能只是一建築形式，但卻也因為與台灣洋樓類似，而更易為居民所接受。
- 2.慶修院本殿四周繞以出簷迴廊空間，成為室內室外過渡空間，有利於遮陽與通風，從台灣濕熱的氣候來說，這種建築處理手法反而有因應風土之意，日本四注式方形佛教建築偶亦有出簷迴廊，但多單邊迴廊或較窄的迴廊深度，但到了台灣卻出現更而增加對抗風土氣候之需要。
- 3.慶修院的高床地坪，係在高床下先築台基，再於台基上立礎石以承接木柱及床版，共計五十多支木柱。這種高床雖然具有日本特有文化之意，但卻與台灣原住民干欄式高床之建築極為相似，適合潮濕多雨多蛇類地域環境需求，因此似乎無意間也算反映了風土氣候上之建築特色。

三、移民政策所建構之日本固有景觀之環境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將台灣西部設定為，較少疾病、衛生較佳、交通設備完善、市場較密、礦業或商業發達之地區，相反的台灣東部則為衛生不良、交通不便之地區¹³。台灣東部本來即缺少便利的交通，清朝時期也少有漢人移居當地，僅僅是原住民的「粗放式耕作地區」。清末雖有較多漢人移居當地，但未開墾地區仍佔大部份，是一「適合於收容移民的理想集團地」¹⁴除此之外當時之台灣總督府在「內地人移殖方法」中亦提及「移住的新天地應盡量維持日本農家、農村之特色，使其彷彿置身於日本內地，一村一邑的聚港，從而減少懷鄉之念」又「日本農家的特色乃是山間小屋。後園種植花卉，夕顏棚下，清風輕拂，柔靜雅緻。……將移民與充滿日本風味的農村一併移居，可使此間的移住者，獲得永久的安心感」。¹⁵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十月所裁定的「移民實行案」亦提及「移民事業乃是將內地農民移殖至本島（指台灣），建立健全摯實的田園農村，可獲致國際上及同化上的效果為目的，由此可得知，開發之目的不是為了與台灣環境的接軌，而是以創造日本景觀為目的。」因此台灣總督府在移民村的建設上，是以建立「健全的農村」亦即以日本的固有景觀為主要著眼點。

慶修院之環境景觀原貌已不可知，幾經修建，在建築方面採出軒式（向拜）入口、木欄杆、寶形造四注式金屬屋面的日本佛寺平面與造型，與台灣常見的傳統閩南式廟宇造形有絕然不同，成為少見的日式風格佛堂。堂時供奉不動明王「光明真言百萬遍」、「百度石」石刻，以及庭院中散佈川滿端二行遍日本四國八十八番寺院靈場，所請來供養的八十八尊石佛皆應為慶修院為配合當時政策而規劃之日本風格庭院之基本元素。

¹³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臺灣總督府，1919，頁 54~55。

¹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臺灣總督府，1919，頁 53~54。

¹⁵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臺灣總督府，1919，頁 25~26。



四、空間領域之探討

界定建築空間的三要素，為地板、牆壁、天花。¹⁶其中牆壁的存在形成建築空間內、外的境界線。堅固人造壁形成內部庇護性空間。強調了牆壁在建築中之重要性。在這樣的思維下，石造、磚造之堆砌厚重壁面是一種具體之表現。但在與「牆壁」之重要性比較下「地板」就顯得單純。對空間的內外等同視之則不分裏外以穿鞋方式進出。相對的慶修院屬於日本傳統木構造，忽視堅固牆壁的存在，重視與大自然的連帶關係，由木柱木梁架構形成流動性室內空間，寬敞自然性的開放牆壁的意識感消失。(圖 4) 室內所區劃之機能，輕快且暢流無阻。顯現「高床」(架高地坪) 建築之對空間內外區劃的境界線。影響社寺布教之儀式作法、坐禪、其他如茶道、舞蹈、古箏、三味線等技藝，皆為「床的建築」之精神而形成之文化。而這種空間形態為何仍流傳至今，除了上述深受「風土」之影響，夏天高溫多濕的氣候，在建築來說比起牆的存在，通風換氣是第一要件外，經由建築機能特性中受「床的建築」行為模式之考量。慶修院排除了能實際界定空間之厚重牆壁，而採用強調形而上「場所」的意識，表現其「床的建築」之空間領域特色。這或許與中國陰陽說，佛教思想有所關係。¹⁷

五、符合布教壇向位之配置

布教壇安置場所、方位有各種說法。一、「南面北座說」佛壇正面朝南，背向北方之配置。這種在布教壇中安置神像、佛具的位置和方位，佛壇不易被太陽所照射，由可防止南方吹來的濕氣，對佛壇法器的保存來說是一較佳的安置原則。二、「本山中心說」¹⁸在佛壇前正座合掌膜拜時，自己宗派之本山的方向於此延長線上，佛壇背西向東安置則有「西方淨土說」面向佛壇之西方極樂淨土膜拜。

真言宗，其布教壇鞏對安置佛壇並沒有一定的向位，但真言宗的寺院(本堂)，條件許可下，則盡可能的向南，即屬「南面北座說」，且避免北向。

慶修院座落於基地之中央面向西南(圖 2)，與基地入口軸線成 90 度，其布教壇之座向附合了真言宗盡可能面南之說。又真言宗本山位於四國恰於台灣東北向之軸線上，亦符合了「本山中心說」對宗派本山方向之膜拜之建築配置。

伍、結 論

日治時期在台灣營建的宗教性建築以神社為主，其數量多達兩百餘處。神社的廣建，正是殖民統治者的威權心態之寫照，相形之下佛寺的興築，則可視為一種伴隨移民而來的文化遷移現象。當然，佛寺建築中也有少數官方色彩濃厚的例子，如台北臨濟護國禪寺、本願寺等，但基本上在在吉野村所建立的真言宗布教所，應是屬於民間自發性的宗教建築。回顧台灣數百年的開發過程，充滿著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衝擊，當眾人注意力集中在海峽兩岸的移民文化互動，或東西方接觸影響等現象時，慶修院兼有日本社寺風格的獨特類型，以及隨著時代的變遷，反映了宗教文化與風土氣候上之意涵，也應該重新受到合理的評價。

¹⁶ 蘆原義信，《街並みの美學》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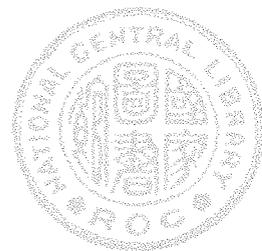
¹⁷ 蘆原義信，《續街並みの美學》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 13。

¹⁸ 池口惠觀，《よくわかる仏事の本 真言宗》，東京，世界文化社，1999，頁 88。



柒、參考書目

1. 近藤 豊，《古建築の細部意匠》，東京，大河出版，1969
2. 宮崎建樹，《四國八十八力所めぐり》，大阪，朱鷺書房，1987
3. 中川 武，《日本建築みどころ事典》，東京，廣濟堂，1990
4. 黃士娟，《日誌時期台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1998.7
5. 台灣神社社務所，《台灣神設誌》，台灣神社社務所，1932
6. 工藤圭章、度編義熊，《古寺建築入門》，東京，岩波書局 1986
7. 伊藤延男，《古建築のみかた》，大阪，第一法規出版社，1985
8. 下村健治，《寺院・神社・住宅の見學必攜》，東京，修成學園出版社，1998
9. 關野 克，《文化財と建築史》，東京，鹿島出版社，1979
10. 石井亞矢子，《佛像の見方ハンドブック》，東京，精文社，1998
11. 村田靖子，《佛像の系譜》，東京，大日本繪畫，1995.5.19
12. 東鄉 實、佐藤四郎，《台灣植民發達史》台北，古亭書屋重印，1968
13. 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史聯雜誌》8 期，1986
14.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19
15.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台政》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77 年
16.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5，花蓮，花蓮文獻會，1979
17. 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花蓮文獻》4 期，花蓮，花蓮縣文獻會 1955.10
18. 東台灣研究會編纂，〈花蓮港廳下的產業〉，《東台灣研究叢書》台北，東台灣研究會，1926
19. 蘆原義信，《街並みの美學》東京，岩波書店，2001
20. 蘆原義信，《續街並みの美學》東京，岩波書店，2001
21. 池口惠觀，《よくわかる仏事の本真言宗》，東京，世界文化社，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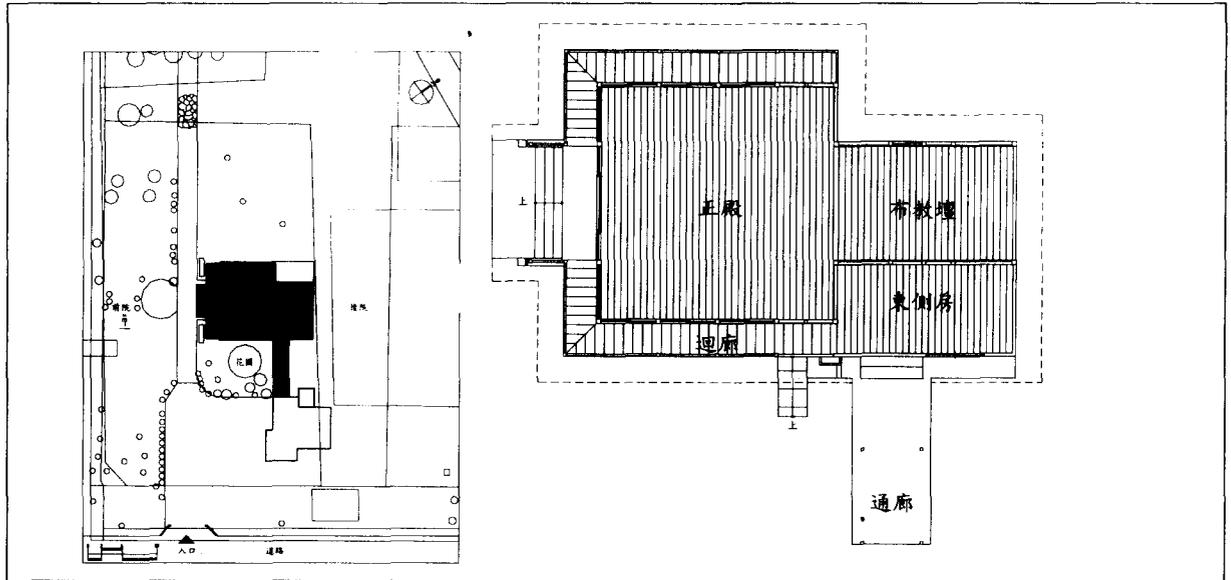


圖 2 慶修院配置圖與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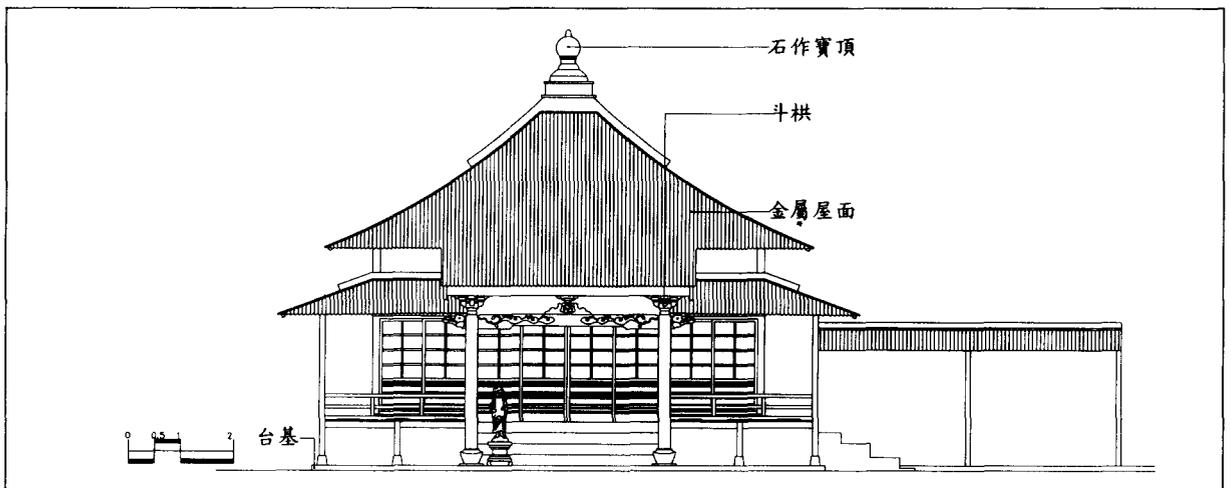


圖 3 慶修院正向立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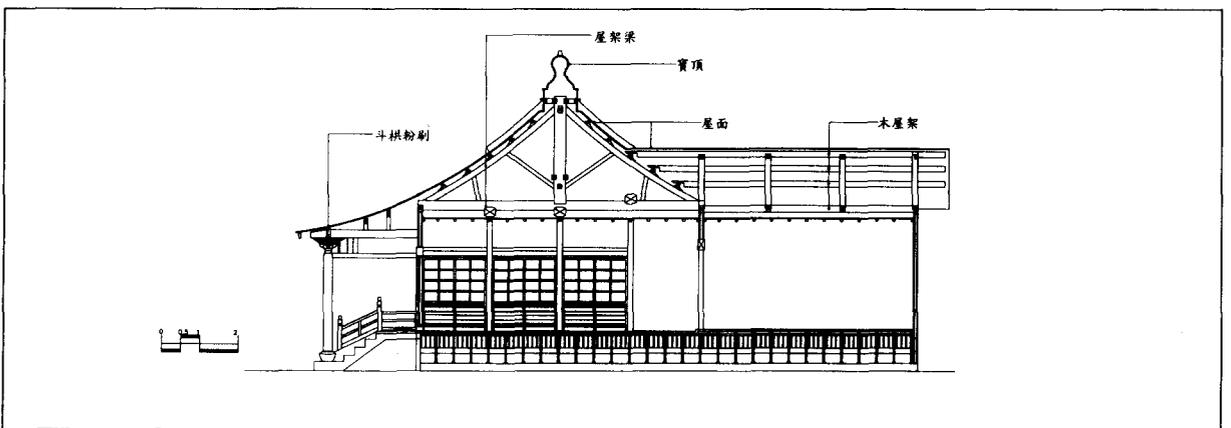


圖 4 長向剖面圖

